

---

# 改革开放 40 年留学教育的影响和习近平留学思想的意义——2018 年江苏徐州“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周洪宇 周 棉 苗丹国 元 青 李又宁 张玉法 小島淑男 大理浩秋 孙安石 余子侠  
田 涛 李雪涛 麦劲生 徐志民等<sup>1</sup>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8)04-0027-05

2018 年 5 月 19—20 日,“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纪念邓小平扩大派遣留学生讲话发表 4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隆重举行。会议由江苏师范大学主办,珠海中国留学博物馆、西安思源学院及珠海市大成中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神州学人》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美国圣约翰大学、日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日本千叶大学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 40 余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档案馆、期刊社的 70 余名专家、学者周洪宇、王晓秋、周棉、苗丹国、元青、李又宁、张玉法、小島淑男、大理浩秋、孙安石、见城悌治、中村翠、沈弘毅、余子侠、李雪涛、麦劲生、金富军、王伟、赵惠霞、田涛、杨晓、管秀兰、郭必强、杨斌、徐志民、周雷鸣、谭皓、吴原元、陈健、王建明、冯国平、杨钊、李秀珍、沈荣国、王格格、祁小平、张卫杰和蔡国春、徐惠萍、周延波、张正祥、姜峥嵘、张文德等,参加了会议。欧美同学会和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给大会发来了贺信。

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从此,出国留学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揭开了中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对当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和改革开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深远影响。

邓小平发出扩大派遣留学生指示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留学教育飞速发展,出国留学人数与回国人数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全方位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社会的进步和国际交流的进程。

大会开幕式由留学生研究专家周棉教授主持,主办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蔡国春教授,协办单位珠海中国留学博物馆筹备中心徐惠萍主任、西安思源学院周延波董事长、教育部《神州学人》杂志副总编朱国亮等先后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等发表了演讲。

蔡国春副校长首先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国内外留学生研究界的精英汇聚彭城,以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心,研讨邓小平扩大派遣留学生讲话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国留学生研究的新进展,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留学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会议围绕“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讲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留学人才思想”“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等论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

<sup>1</sup> 收稿日期:2018-05-21

## 一、关于改革开放 40 年留学教育和习近平留学思想的研究

周洪宇教授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关注留学与人才工作,将这一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的战略问题进行思考,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就留学与人才观、人才的标准、人才的培养、留学与人才的管理使用以及人才的环境等问题做出很多精辟的论述,不断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一个内容丰富、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留学与人才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中国留学与人才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留学与人才思想,对于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留学与人才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核心思想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时代特征。习近平留学与人才思想是一个科学系统、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留学与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研究留学教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留学与人才”的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留学教育的指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服务。

周棉(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小平发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革”闭关锁国十年之后走向世界的勇气和胆识,对于推动新时期留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此,中国的留学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留学生人才成为“科教兴国”的中坚,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留学思想指导下,中国的留学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国大潮依然汹涌,回国大潮空前猛烈。随着中国留学生的步伐迈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与各国的教育交流也日趋活跃,在当今信息传播的载体、主体、速度和内容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网络化时代,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自然地会把留学所在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教育科学等信息,通过最新、最便捷的传播方式传回国内。与此同时,每个中国留学生个体所传出的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的信息,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丰富、充分、自信和自豪。因此,在“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将发挥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苗丹国(教育部国际司原调研员)邓小平发出扩大留学生派遣的重要讲话时,还没有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改革开放,但邓小平以过人的胆识、魄力和战略眼光,做出了扩大留学生派遣的决策,为中国的留学事业和改革开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今天,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国留学事业取得空前发展,有必要增强理论自信,研究并创建留学工作理论。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构建的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研究领域:既有时代的使命与责任,也有制度的需求与优势;既有数百年留学历史与留学实践的支撑,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融入以及留学人员群体与国际化对象互动关系的推动;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相关学科发展建设的有所作为。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是双向的,留学生的交流也是如此。但是以往我们的留学生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而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研究非常少。随着新时期中外留学交流的蓬勃发展,每年都有大量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留学生接受国。因此,我们应重视外国来华留学生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这不仅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来华外国留学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又是中国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和中外友好关系的推动者,值得研究。这项研究还能为我们今天改进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教育,为世界培养优秀人才,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合作作出更大贡献,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留学派遣的讲话,迅速成为国家留学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出国留学成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留学活动的发展,教育部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接连出台了一系列、一整套关于出国留学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出国留学事业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这次会议就中国留学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论述题材广泛、视角新颖、内容丰富,很多选题具有开拓性,可以说把中国留学史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李又宁(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终身教授) 留学事业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应当是一个很熟悉的事业,只是到了清朝闭关之后,留学才减少。直到容闳之后,留学又重新成为了比较新鲜的事业。因为,容闳和留美幼童留学西洋,所以更引起中国人的特别关注。留学西洋和中国的现代化密切相关。我觉得此次研讨会以“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为题,意义深远。

目前现代化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西洋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向西方学习科学,这是一个阶段。现在应当进入第二个阶段,怎么样帮助和挽救欧美继续发展。因为我生活在美国,所以我看得比较清楚,而且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的大学。我们应该了解美国,而且想要帮助美国甚至于世界的共同发展。我们还应当要贡献,不仅要学习,因为这是最好的时机,我们不只是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们也有很好的东西可以贡献。中国的现代化才走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更重要,更能够表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不只是一个学习西方科技的民族,中华民族还永远想着世界,永远想着贡献,永远想着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拥有的文化和精神与世界共享。

王建明(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海外高层次留学回国政策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 留学回国政策本身存在一些盲点或缺陷,许多留学回国政策大多由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颁布,或属于立法层次较低的规范性文件,或由相关部门的规章,并不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且较多存在重引进,轻使用,重物质刺激,轻环境保障的问题;2. 留学回国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存在的问题;3. 行政主导色彩浓厚,用人单位参与少、落实难;4. 留学回国政策忽视对中青年科研骨干的吸引;5. 重视个体引进,忽视科研群体和团队引进。改进海外高层次留学回国政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对策。第一,政策制定要少而精,要给用人单位实施政策的灵活性,充分体现用人单位主体需求性。第二,加强高层次科技引才中介机制建设,健全留学人员的信息交流平台。第三,加强高层次科技引才中介机制建设,健全留学人员的信息交流平台。第四,转变用人思路,变“待遇引人”为“事业留人”。第五,建立和健全留学回国政策评估机制。第六,加强对海外中青年科研骨干和高水平科研群体或团队的引进。

岳婷婷(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邓小平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性指示,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序幕,吹响了中国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引发了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留学潮,同时也翻开了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国政府制定全方位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基础。作为中美恢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象征,首批公派留美人员的派遣不仅极具政治色彩,释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而且重新搭起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时代。

祁小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邓小平留学教育思想在理论上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留学教育理论的空白,成为中国关于出国留学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留学潮”“归国热”,催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推进了中国科研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 二、关于中国留学史及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

张玉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的贡献很大。首先,第一代中国的革命几乎都与留学生有关系。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就是典型代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领袖,包括宋教仁等,都是留学日本的。在他们的宣传下,许多留日学生都回国参加革命。后来就完成了近代转型,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外,还有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有非常大的影响。最早在晚清,有两个人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严复,第二个思想启蒙家是梁启超。接下来第二个时期是五四时期,有两位思想启蒙大师。第一个是蔡元培,另外一个思想启蒙大师是胡适。总之,在思想启蒙上留学生是我们的导师。

大里浩秋(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 20 多年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有两点体会让我感悟至深:

第一点,关于日本留学起始的清末时期的各种混乱和试行错误。那是从派遣方和接收方双方都能看到的现象,包括并不能只一笑置之或将其否定的一些情况。作为派遣方,不论是北京的中央各官署和学堂及各省政府学堂和军事学堂等官费派遣的,还是

---

各省级州县地方公费派遣的,都期待通过留学来获得知识和技能并在回国后发挥作用。作为接收方的日本,指导落后的中国教育,试图从教育方面将中国置于日本影响之下,不间接接收条件充分具备与否,就接收了很多留学生,不单学校,甚至各官厅或企业也招收留学生。

第二点,民国时期的日本留学是随着日本政府、军部领土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留学生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并转移到行动上的时期。中国人赴日本留学从最初就是祈盼祖国起死回生的众多青年志愿的事情,和去其他国家留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国人日本留学无疑是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希望今后也不要急于下结论,把调查研究继续下去。

孙安石(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我认为:第一,对于世界上后发国家而言,留学生前往发达国家学习是不可避免且充分必要的,而且留学生在后发国家的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第二,研究留学生问题要充分利用档案资料;第三,本次会议的成果和经验,为日本方面留学生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经验。

余子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自1914年以来,一批批进步女性知识分子有感于本国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落后,纷纷争取“庚款”赴美留学,至美后即积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归国后,她们除了通过教学育人、翻译、演讲、著书立说等方式,直接将留学期间所学分享给国人以外,还通过在各个领域的勤勉工作,将所学所感以间接的方式传递给了广大同胞。相较于男性公费留学而言,始于“庚款”留学的女子公费留美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批次较少,但一批批“庚款”留美女性通过自身的勤苦努力取得了不输男儿的历史成就,见证并昭示了清华学校“派送专科女生赴美”政策的成功。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的近代化,客观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到国外留学的群体,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他们在国外生活、读书,向国内传播前沿的思想、文化乃至科学知识,很多的学科也正是通过留学生的引进才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崭新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深入观察和切身感受,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现象。留学生的本土意识也正是在融入世界潮流的时刻得以凸显。1930年代留德学人群体也为我们研究民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对理解从传统中国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麦劲生(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力图为民族和文化寻求更新自强之道。在巨大的变迁之中,人们不自觉地重组自己的生活与生命,更高瞻远瞩的精英为大众求更彻底的社会变革。在批判传统之路上,有人越走越远,越走越激进,也有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以张君勱、贺麟和宗白华为代表的留德学人,早年既受传统教育,又经德国教育文化熏陶,既知中国文化的不足,又同时了解西方科学和工业文明的危机。在民族危机之前,他们自觉诊断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潜在问题。受德国启蒙到浪漫时代思想的引导,以至在德国受教育和生活经历的影响,他们从不同路径探索重塑中国心灵的方法,并相信国民人格的重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他们分别从德国政治哲学、哲学和美学的不同路径出发,但得到相近的结论,同时肯定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田涛(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清季新式报刊兴起后,成为再现中国社会面貌与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由新式报刊构建的信息与舆论空间中,留下了清末不同社会成员纷纭复杂的影像,喧嚣一时的留学人群同样包括在内。报刊有关留学和留学生的各种消息与报道,以及对留学界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景况的记述,既反映了社会对留学生的认知,也勾画出了留学生在社会中的复杂形象。清季报刊中的留学生形象是分裂的,或者说,是反差颇大的各种不同影像的叠加共同构成了清末留学生的社会形象。清末报刊所勾画的留学生形象,既受到媒体自身理念的影响,也受到大众认知的潜在指示。此外,清末民间报刊所具有的商业性和消费性特征,也同样会对留学生形象的塑造产生影响。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留学生群体形象呈现出色彩斑驳的特征。

小岛淑男(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同盟会成立后,来自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豫、晋、秦、陇四省协会。此协会名义上是为加深同乡情谊而设立,但实际上却是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现在能够查明的四省协会会员,

---

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各种革命活动。其历任会长有于右任(陕西籍)、刘基炎(河南籍)、景定成(山西籍)、赵世钰(陕西籍)等。武昌起义后,陕西、山西两省迅速实现独立,四省协会本部也由东京转移至上海并召开总会。1912年2月,南北议和达成之时,所有的北伐军和东征军如秦、陇、豫复汉军等革命组织相继解体,四省协会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聘请外籍专家、教师和派遣留学,积极学习西方,成效显著,不仅成为洋务派反驳顽固派阻挠留学的例证与榜样,而且为甲午战后中国人赴日留学发挥了示范效应。不过,在“以日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背后,恰恰是明治维新所遗留的忠君爱国思想、军国主义教育等封建残余。这既适应了清政府派人留日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主观愿望,也适应了中国学子整军兴武、留学救国的迫切需求,成为身陷民族危亡边缘的中国各界达成留日共识的思想基础之一。日本明治维新兴办教育、创办近代学校,客观上为接受蜂拥而至的中国留日学生提供了一定条件。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错位的历史吊诡之处,恰恰反映了东亚各国近代化带来的彼此关联化、一体化的大趋势。

周雷鸣(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留学生是中央研究院学术研究的主体和骨干。派遣研究人员出国留学是该院培养高层次学术研究人员的主要形式。中央研究院派遣研究人员出国留学经历了抗战前、抗战前期、抗战后期及战后等阶段,呈现出曲折发展的轨迹。中研院派遣留学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务实性。根据研究工作需要,派遣研究人员出国留学,时间长短不一,以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而非以取得学位为目的。其二,派遣渠道的多元化。由于缺乏经费,中研院在院款资助的同时,鼓励并支持研究人员申请中基会等各种奖学金,参加清华大学、中英庚款、教育部等公自费留学考试,对与该院研究相关者,以给予津贴为条件,吸引其学成回院服务。其三,选拔方式有别于一般留学。院款资助出国研究的资格审查和选拔,适应研究机构的特点,以研究成绩为标准,而非以一般留学考试的形式。其四,出国留学研究成为中研院高级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

谭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在留学史研究中,学界对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加之资料阙如,长期以来对其知之甚少。近代以降,日本明治政府各部门出于各自目的,对华派遣了留学生。其中,日本军方派遣的留华学生,不仅利用留学的机会习得汉语,而且在留学期间及留学期满后,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华侦察,为日本军、政各界提供了重要情报,后来甚至参与到日本对外侵略和殖民之中。日本军方的留学生派遣,兼具的留学与侦察双重性质,本身就说明留学教育已沦为其侵华战略的附庸,丧失了本来的意义。本可成为中日两国军事交流使者的军方留华学生,却沦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